两会原生态

叶青提了10年公车改革,人称“叶氏车改”;韩德云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较劲了7年,以至于记者每次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年还提吗”;同样较真的还有黄细花、蒋洪,前者长期关注控烟,而后者每年必讲阳光财政。

这些年,有一部分代表委员锲而不舍地反复提一个建议或提案,他们为何如此“较真”?

这些年他们一直在提同一条建议提案

代表委员“较真”推动难点问题解决

本报特派记者 吉祥 杨凡 刘红杰 马绍栋

A 一条建议提了10年

7日,全国政协经济界的小组讨论会,陈晓颖委员的发言是关于食品药品改革,这个问题她已经在两会上提了10年,这次为了引起注意,她专门准备了一个10分钟的PPT进行演示。

一个建议提了10年的还有叶青,这位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履职人大代表的10年间,每年必提公车改革。“凡是用公共资源购买的车都应纳入公车改革范围。”他今年的希望是公车改革能够出现几个试点。

在本届代表、委员履职的最后一年,执著者不乏其人,一些代表委员期待着他们上任伊始提的建议能早日见到实效。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提了5年的阳光财政,他采访时重复着那句已说过多年的话:“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已白了。”

谈及为何这么较真,陈晓颖解释说:“之所以这么执著,是因为我也是消费者。这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越多的人共同推动,就能越快越好地促进问题的解决。”

全国人大代表姜玉泉 吉祥 摄

B “越是深层次的问题,解决起来越难”

熟悉代表建议操作流程的姜玉泉介绍,代表在大会期间提的建议、议案最终会转交给相应的职能部门办理。“从代表的角度讲,提建议总是希望得到解决,但从国务院相关部委的角度考虑,有的问题解决起来政策有限制,有的资金有限制,再则办事有一个过程。”姜玉泉说,一些代表委员长期反映一个问题,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些问题解决起来比较难。

全国人大代表、惠州市旅游局局长黄细花5年来一共提了76条建议,诸如取消银行卡跨行收费、升格环保部等建议被采纳,但也有一些她提了多年的建议至今没见解决迹象。黄细花说,有的建议转交给相关部门后,她收到的答复也很简单,“只有几行字。”

而最让全国政协委员施杰感到遗憾的不是相关部门的答复态度,而是被重视的提案依旧得不到解决。施杰两会期间曾多次提过乡村道路安全的提案。“包括农业部、交通部、公安部都很重视,积极跟我联系,称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也表示解决起来存在很多问题。”施杰说,各个部门都有不同的原因,“马上解决也有一些客观因素,越是涉及到多个部门深层次的问题,解决起来就越难。”

全国政协委员施杰 吉祥 摄

C 较真推动改革,督办力度逐年加大

想到自己提了多年的建议,黄细花有时会想“要不就算了吧”,但这时她又会觉得应该再坚持一下。“我总希望这些部门能换位思考一下,像取消银行卡跨行收费,这对提高银行服务质量,吸引顾客也是有好处的。”黄细花说。

对这些长期提一个建议呼吁改革的代表委员,姜玉泉很是佩服。“比如取消农业税,就是东北一个农民代表连续提了7年,最后终于解决了,说老实话,我当时就不敢提。”姜玉泉说,正是有一些较真的代表委员,一些问题才最终得到了解决,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也是湖北一个代表提了很多次,“不停地提更加说明了老百姓的期盼,国家应该创造条件解决。”

沈士团是全国政协第九、第十届委员,他的绰号是“4%专业户”。1998年第一次参加政协会议时,他就当面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呼吁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应达到GDP的4%,到他履职全国政协委员的第9年,他的大会发言还是关于4%。今年3月5日,当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政府要兑现这一承诺时,沈士团第一时间接到了朋友的祝贺电话。

呼吁公车改革的10年间,叶青也注意到了这其中的点滴变化。比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公车改革”,叶青直言这是进步。

全国人大代表叶青

早教课程费赶超大学学费

全国政协委员雷后兴建议填补早教机构监管空白

本报北京3月12日讯(特派记者 张鹏飞) 几间房子、几个保教人员、几本小人书、几样小玩具就成了一个早教机构,一个早教课程动辄两三千元……这样的混乱现象制约着婴幼儿的健康成长。全国政协委员、丽水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雷后兴在今年的提案里建议明确早教主管部门,填补早教机构的监管空白。

“早教机构内部管理混乱无序。”雷后兴表示,目前国内的早教机构课程设置各行其道,没有经过权威专家机构的鉴定,各早教机构的早教师资也绝大多数没有“早教指导师”资格证,这严重损害0-3岁婴幼儿的健康成长。

另外一些早教机构为了降低成本,很多租用的房子都较为狭小,婴幼儿活动场地不足,消防等安全设施难以到位。有的地方,几间房子、几个保教人员、几本小人书、几样小玩具就构成了一个早教机构。

雷后兴介绍,除了内部管理混乱,早教的主管部门也缺失。目前,教育部门只管3-6岁幼儿学前教育机构的审批监管工作,而0-3岁婴幼儿早教机构处于政府监管的空白。

“这导致两大问题,一个是早教机构费用高昂,且无需审批。”雷后兴举例说,国内品牌早教机构的收费是一节课100元左右,24节课一个课程,也要2000-3000元。早教仅24节课的费用甚至赶上了大学一学期的学费。而多数早教机构的收费标准未经物价部门审核监管,给家长的收费发票也是商业运营发票。

提案建议:

达到办学标准再发许可证

针对主管部门缺失,雷后兴建议明确0-3岁婴幼儿教育的主管部门和相关责任部门。0-3岁婴幼儿教育有其特殊的规律,这一年龄段的教育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他建议各级教育部门为0-3岁婴幼儿教育的主管部门,财政、发改、卫生、妇联等部门为相关责任部门。

另外,他建议对早教机构的办学指导思想、资金、师资、安全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对达标的早教机构发放办学许可证,不达标的要责令限期整改或者予以取缔。对早教机构的收费项目要严格审查和监管,定期对其财务情况进行审计公布。

全国人大代表蒋海鹰:

让优秀律师加入法官队伍

本报北京3月12日讯(特派记者 张洪波 郭静) 法官当律师,很常见;律师当法官,很困难。“为什么我国的法官只能从刚获得法律职业资格和通过公务员考试的年轻人中选呢?为什么那些经验丰富又很成熟的律师当不了法官呢?”3月12日,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汕尾党校常务副校长蒋海鹰在分组讨论时,发出这样的疑问。

“律师要当法官,就要先考公务员,而且受到入职行政级别的限制。”蒋海鹰说,“如果一名律师在岗位上锻炼了十几年,已经是很成熟很优秀了,年龄也到了三四十岁,这时候你喊他来考公务员,而且即使考上了,也要先从书记员、初任法官干起,这显然不公平。”

蒋海鹰认为,要想改变这一点,就必须制定新的实施办法,让优秀资深律师能够被选拔进来。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

尽量放开对公益诉讼限制

本报北京3月12日讯(特派记者 任志方 李钢) “在公益诉讼方面‘两高’是否可以适当放开一点,有些违法案件不是侵犯具体的人,而是侵犯公众,检察院能否行使职能提起诉讼?”在3月12日上午的政协分组讨论过程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建议。

朱征夫讲了一个发生在广州的案例。“广深高速上之前没有一个厕所,没有一个加油站,很多司机都感到不方便。后来一个律师去起诉高速公路公司,但是起诉又没什么依据,他就自己把车开下去,中途出站加油,然后再回来。最后把所增加费用的收据拿到法院去告高速公路公司。最后官司打输了,但是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加油站和厕所就悄悄建起来了。”他建议尽量放开公益诉讼的限制。

全国政协委员侯欣一:

一年办案1000多件 基层法官压力大

本报北京3月12日讯(特派记者 刘志浩 王僖) 3月12日,全国政协社科组讨论“两高”报告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表示,目前基层法官面临巨大的办案压力。

他说,在东莞调研时发现,一个基层法院的法官一年办案1000多件,平均每天三四件,北京某区的法官要做出判决的案子一年700多件。同时,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全社会对法官关注太高。目前法院处于直面社会矛盾的第一线,“大家一有事,首先想到去法院。”造成法院案件数量剧增,相应的法官压力也增加很多。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部级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王秀红表示,这一问题已引起最高法院关注,并已采取积极应对措施。

个股情况 仅供参考
据此操作 风险自负